

主编

何炳武 撰写

何炳武 王永莉 李 巍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编

(下)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书法家协会 编

# 陝西書法史

(下)

主编 何炳武 撰写 何炳武 王永莉 李巍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第四部分 陕西书法的沉寂期（宋—明）

第十三章 北宋陕西书法	3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3
第二节 西安碑林的创建	6
第三节 宋代书家和作品	15
一、范仲淹在延州的书法创作	19
二、李建中的书法贡献	25
三、苏轼在凤翔的书法创作	28
四、薛绍彭的书法创作	30
第四节 宋代书论	41
一、宋书法理论的共同特征	42
二、苏轼任凤翔府判官前后的书论	49
第十四章 南宋陕西书法	55
第一节 南宋历史文化背景	55
第二节 南宋陕西书家和书作	58
一、韩世忠的书法创作	61
二、陆游在南郑、大散关的书法创作	61
三、金代陕西书法	70
第三节 南宋书论	74
第十五章 元代陕西书法	84
第一节 元代历史文化背景	84
第二节 元代西安碑林的整修与收藏	86



第三节 元代陕西书家与作品 .....	90
一、赵孟頫的书法创作 .....	90
二、蒙元时期的陕西碑石书法 .....	101
第四节 元代书论 .....	108
一、重法的思潮 .....	109
二、复古的倾向 .....	110
三、书之法与变的结合和统一 .....	111
四、提倡本乎六法的书法风格 .....	112
<b>第十六章 明代陕西书法 .....</b>	<b>114</b>
第一节 明代历史文化背景 .....	114
第二节 明代碑林的整修和收藏 .....	121
第三节 明代陕西书家与作品 .....	126
第四节 明代书论 .....	138
<b>第五部分 陕西书法的勃兴期（清—民国）</b>	
<b>第十七章 清代陕西书法 .....</b>	<b>151</b>
第一节 清代历史文化背景 .....	151
第二节 清代西安碑林的整修和藏石 .....	156
第三节 清代陕西书家与作品 .....	160
第四节 清代书论 .....	208
<b>第十八章 民国陕西书法 .....</b>	<b>220</b>
第一节 民国历史文化背景 .....	220
第二节 民国西安碑林的整修和藏石 .....	221
第三节 民国陕西书家及作品 .....	224
一、民国中国书法发展特征 .....	224
二、民国陕西书法发展概况 .....	226
三、民国陕西本土书法家 .....	229
四、现代客居陕西的书法家 .....	255

第四节 陕西当代已故书法家专题 .....	273
第五节 民国书论 .....	287
一、王世镗的章草研究 .....	287
二、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研究 .....	288
三、张寒彬与“西京金石书画学会” .....	289
四、沈尹默的书学研究 .....	290
后记 .....	295



## 第四部分

### 陕西书法的沉寂期（宋—明）



## 第十三章 北宋陕西书法

### 第一节 历史文化背景

后周显德七年（960），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北宋王朝建立，此后十余年间，赵匡胤兄弟经过与南方割据政权之间的统一战争，终结了中原地区长达半个世纪的动乱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北宋。鉴于中唐以来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北宋统治者采取了重文轻武的统治政策，一方面削弱地方官与军事统帅的军权，一方面强化文官统治，利用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上起宰相，下至州县官员，都由进士出身的文人担任，有效地遏制了藩镇割据，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统治更加巩固。然而，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从一开始注定注定了其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仅昔日汉唐雄风荡然无存，甚至连燕云十六州之失地亦难以收回。北有辽、金雄峙，西北有西夏虎视，虽号称大国，终在游牧铁骑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高粱河之战后，几乎每战必败，

“澶渊之盟”后，领土渐小而“岁币”日多，庞大的官僚机构，外忧内患如巨大危石时刻悬于宋人之头顶。1069年，王安石借宋神宗之支持，施行改革，企图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力，然而不仅效果甚微，反倒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靖康二年（1127），金国南下开封，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归黄龙，北宋遂告灭亡。宋高宗仓皇南渡，建都于临安，是为南宋。

社会政治与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促使中国文化亦产生了新的变化，昔日开放、外倾、色调热



13-1 宋太祖赵匡胤像

烈的唐文化，日渐向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宋文化转化。

文化的转型首先表现为哲学思想的建构。与两千多年前孔子创立的以“克己复礼”为中心的“仁政”学说相比，宋代形成的理学思想更注重宇宙与人性的本质思考，其以儒家纲常伦理为“天理”，充分强调人对“天理”的自觉意识，突出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等自律规范，促使那些积极入世的文人士大夫们主动地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欲求。禅宗思想的“超然物外”与“顿悟”则更广泛地渗透进士人们的处世哲学之中，其深邃奥秘的禅心佛理，成为吸引众多文人的思想渊薮。老庄哲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又恰到好处地迎合了那些政治上不得意的士人们对生活、心灵以及艺术情趣的要求。理学的知性反省、禅宗的“超然物外”与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趋向，直接影响了宋人的文化人格与艺术审美。宋代文坛以词为时尚，诗歌则多为文字、学问与议论之流，歌颂山水社会表情达意者罕少。宋词之婉约雅润；宋文之舒和澄定；宋画之优柔恬静；即连宋人之饮茶，亦颇重品第与烹点之胜妙；宋瓷渐脱繁丽丰腴，而呈尚朴淡重意态之势。宋代服饰追求简朴清秀，以洁净为美。整体而言，与唐人之狂放不羁、热烈奔放相比，宋人的文化心理结构逐渐转向精致内敛、温文尔雅。

北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逐渐东移，陕西亦从昔日的至高地位而沦为攸关国防安全的西北重镇。为巩固国防安全，宋王朝在陕西东部、北部和东北部设有三路、二府、九州及所属郡县；西部设一路、一府、二州及所属郡县；南部设一路、一府、四州及所属郡县，广驻重兵以拱卫京师。陕西北与西夏毗邻，自公元983年至公元1127年，双方冲突不断，战火纷飞，前后发生大小战争无数，其中绝大部分战役都发生在陕西北部。1038年李元昊称帝之



13-2 寇准像



13-3 张载像

前，双方互有胜负，此后西夏逐渐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公元1042年，西夏军长驱直入渭州，李元昊甚至宣称“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sup>[1]</sup>。范仲淹任职永兴军路与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后，着力抗击西夏侵略，西北边防稍趋稳定。陕西诸路虽远居西北边陲，拱卫朝廷边防安全为第一要务，然文化教育亦颇受重视，未尝有丝毫懈怠。州、县之学设置一如他州，常设州学教授二人，县学一人，教学内容亦“以经术德艺训练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为准。诸如寇准、张载、范祥等著名文人贤士，皆以官学、科举而入仕。官职最大者当推寇准，而影响最大且为陕西文化教育之象征者则属张载。张载少有大志，初学军事，后专攻儒学，常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宗旨，应科举，中进士，遂入仕途。十三年后辞官归里，先后在眉县、扶风开办书院，授徒讲学，著书立说。著《西铭》、《正蒙》、《易说》、《语录文集》等作，后编为《张子全书》，开创了“气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为宋代时期影响巨大的陕西籍思想家、教育家。曾讲学汴京，听者云集，在当时的士大夫中颇有影响。张载家住关中眉县横渠镇，其一生讲学之地与学生多在关中地区，其创立的学派亦被称为“关学派”或“关学”，是宋代理学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重要学派。文学艺术方面最值得称道的是长安画家李成，其以善于绘画平远山林的山水画而著称于时，为古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宋时期陕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与全国保持着统一步调，这种文化态势直接影响了陕西书法理论与艺术创作的发展方向。

[1] 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 第二节 西安碑林的创建

书法史，是历代书法家从事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理论研究的历史。其研究对象既包括历代书法家从事书法艺术创作活动所产生的碑刻法帖、卷轴屏风等，也包括他们阐述自己对书法审美、创作等的思想的著作等，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数量浩如烟海。单就书法作品的书写载体而论，就有书写于纸张上的，有刻写、悬挂于门楣、楹柱上的，也有刻写、树立于碑石上的。岁月流逝，散佚者良多，流传至今的或存于私人之室，或藏于碑林之中。碑林者，古已有之，大小规模不等，数量亦堪称浩富。其中规模最大、收藏最全、影响最大者，当推西安碑林。

西安碑林创建于北宋，当时收集的历代书法的顶峰之作皆入藏其中，不仅有助于历代书法碑帖的有效保存，为其后的书法家临摹前世名作继承书法传统提供了高品位的借鉴与有利条件；而且对书法家的创作心态、

笔法、结字、章法乃至艺术风格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西安碑林的创立，无疑是陕西文化史、书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清代著名书论家阮元曾提出“北碑南帖”的所谓碑学、帖学，认为书法的传媒手段不外乎碑、帖两种，所谓“碑”即在纸上



13-4 西安碑林



13-5 西安碑林内景

书写后刻于石碑纸上者，所谓“帖”即直接写在纸上。事实上，中国书法的传播手段，就是刻——铸——刻的发展过程。当然，无论刻还是铸，写即创作都是第一位的。第一、二阶段中，从事书法写作的人是不为人知的，是默默无闻之人。第三个阶段中，则开始在石碑上注明“书丹者”，书法创作本体的自主意识开始萌发，也标志着书法家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书法艺术的传播手段主要受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最初的“刻”，是殷商时期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及至西周，文字开始铸刻在青铜器与石鼓之上，即金文与石鼓文。秦汉以后，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良，纸张逐渐应用于日常生活后，书法通常写在纸上。但是，真正庄严神圣且易于长久保存的仍然是“刻”，即先在纸上书写，后刻在石碑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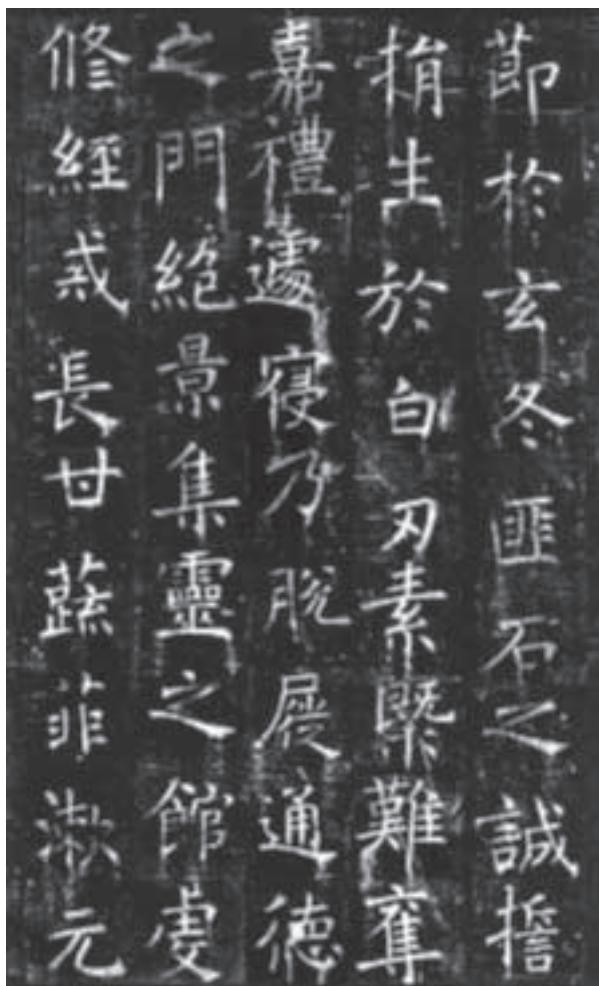
一般而言，书写载体与传播手段不同，书法创作本体的创作心态就不相同，其用笔、结字、章法的特点也会有所不同。书于纸上，心态轻松自然，无拘无束，多以抒情写意为主，天下三大行书《兰亭序》、《祭侄稿》、《黄州诗帖》即属此类，恰如启功先生极力强调的“师笔不师刀”。写后刻在枣木版或石碑之上，其目的均在于传播保存，以刀为笔，以锋利的刀锋表现柔性的笔锋，虽有“失真”之嫌，然意韵犹存且传之久远，故平生神圣之感，下笔时自然庄严凝重，举轻若重。后世书人从这两种手段中，具体地了解书法之过去，体悟

书法创作之真谛，感受书法艺术之魅力，继承艺术之传统，创造书法之未来。

因此，宋以后的陕西书法家无疑是幸运的，碑林为他们提供了临摹借鉴的最佳范本，同时，也为他们提出了前进的方向与高度，因此，他们站在历史传统的高度上高瞻远瞩，厚重朴拙而不乏创新，这其中，碑林功不可没。因此，西安碑林史，就是宋代以后陕西书法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西安碑林在北宋时期的出现，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它与唐代石经以及唐宋其他碑刻的迁置与保护密切相关。北宋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

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蔚然成风，金石学大兴，碑刻即是其中之大宗。当时的长安，尽管已经沦为西北一府，但其十三朝古都的厚重历史，以及保存的无数包括碑刻在内的历史遗迹与遗物留存，都是众多金石学家高度重视、极其青睐的研究对象。京兆府守官和地方士绅，自唐代末年开始，便将位于唐长安城务本坊内的原国子监及其中的开成石经，迁于新城内尚书省西隅。五代至北宋初年，这里又改为京兆府城文庙，唐代开成石经即置其中。北宋建隆三年（962）和大中祥符二年（1009）又两度修葺。北宋景祐元年（1034），又于文庙中创建京兆府学。至和元年（1054），又附设京兆府小学，仍居文庙。元祐二年（1087），吕大忠将唐代开成石经及其他



13-6 唐 褚遂良《孟法师碑》（局部）



13-7 宋 梦英《篆书千字文碑》（局部）

唐宋碑刻迁至京兆府学之北牖。直至崇宁二年（1103），虞策迁建府学、文庙于京兆府城之东南隅，唐代石经以及唐宋碑刻又一并迁入，即今西安碑林现址。此后，后人又不断收集散落于长安附近的碑石，收藏其中，最终形成了一个以收藏历代碑石为目的的特定场所，即西安碑林。

关于西安碑林创建的具体时间，毕沅依据《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定为吕大忠将唐石经移于府学之北牖的元祐二年（1087），原因是此次移置已经对碑刻进行了分类规划，位置已基本确定。《石台孝经》立于中央，《开成石经》分东西依次陈列，诸多唐宋书法名碑分布于庭之左右。另一种说法，即碑林的创建时间应该在崇宁二年（1103），即虞策迁移府学、文庙和唐石经及其他唐宋碑刻于碑林现址之时，原因是此次藏石的规模更大，地址又在现址，象征意义更强。

碑林最初的藏石情况，当时人的金石著作、有关记事碑文和碑石本身均有记载，计有唐宋刻石43种，其中宋代摹刻秦刻石1种，唐碑15种（包括宋代翻刻4种），宋碑27种。加上原本已在文庙的《开成石经》和《石台孝经》，共有藏石45种。时人的金石著作如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收录有400余种碑刻，其中有6种藏于碑林。赵明诚的《金石录》收录有自三代至隋唐的金石拓本2000种，现藏于西安碑林的有22种。郑樵的《通志·金石略》录有1500余种碑目，存于京兆者80种，现



13-8 宋 梦英《十八体篆书》（局部）

时期移入文庙的。《争座位稿》也是宋初重刻在文庙的《抄高僧传序》碑阴。碑文中的“褚”，是指褚遂良所书《孟法师碑》。“欧阳”当指欧阳通所书《道因法师碑》，因为欧阳询所书的十种碑均未入藏碑林。“徐”当指徐浩所书《不空和尚碑》。“柳”当指柳公权所书《玄秘塔碑》。碑文中的“偏旁字源之类”，是指刻于咸平元年（998）的梦英所书《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篆书千字文》、《十八体篆书》、《夫子庙堂碑》、《抄高僧传序》，都是宋初先后刻立于当时文庙的。碑文中还提到，与《石台孝经》一同“立之于中央”的“建学碑”，应是景祐元年（1034）范雍奏立府学时所立之碑。

梦英《篆书千字文碑》，宋乾德三年（965）立。碑螭首龟趺，周兴嗣次韵，梦英书并题额，袁正己书释字，安仁裕刻，吴廷祚建。文25行，行40字，篆书，释

藏于西安碑林的有18种。陈思的《宝刻丛编》以当时的京、府、州、县分类，列于京兆府者111种，长安县162种，万年县165种，现藏西安碑林者13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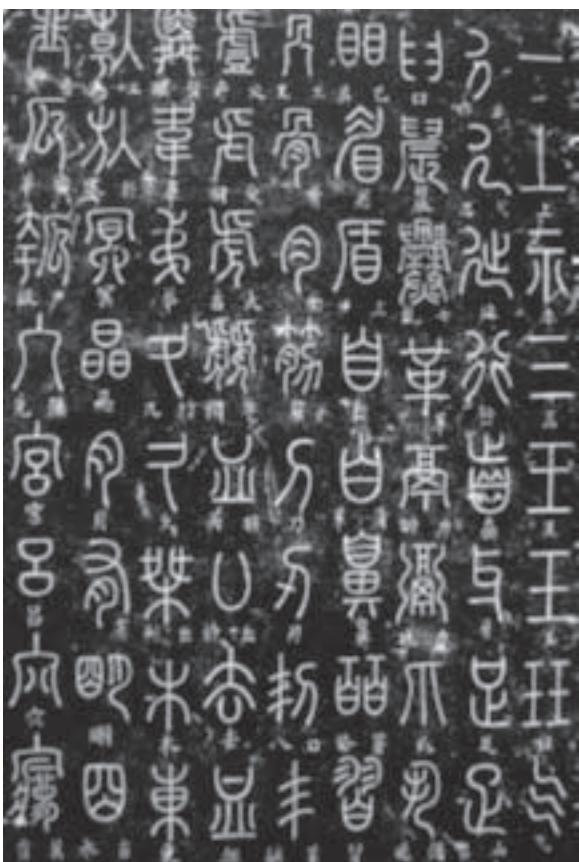
有关记事碑文，如元祐五年（1090）由黎持撰文、安宜之所书的《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记载了此前陆续搜集到“尚书省西隅”的唐宋碑刻。碑文中的“颜”即颜真卿所书的碑刻计有3种，《颜氏家庙碑》为太平兴国七年（982）移此，是碑林最早的藏石之一。

《多宝塔感应碑》也是这一

文楷书。额题“篆书千字文碑”6字，2行，行3字，篆书。《千字文》序刻于乾德五年（967），陶谷撰，皇甫俨书，安仁裕刻，吴廷祚建。文21行，行35字，楷书，碑体完好，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梦英其人，《宋史》中无传，祖籍衡州，早年出家为僧，师号宣义。效十八体篆书，尤工玉箸篆发。其传世书迹除此碑外还有《十八体篆书》、《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等。明代王世贞评价其篆书“笔亦自整劲”，赵崡《石墨镌华》则认为梦英正书第一，篆书次之，分隶又次之。此碑释字之人袁正己与序文作者皇甫俨在当时也号称楷书高手，皆习欧阳询笔法，书风以方严峻整为主。

梦英《十八体篆书》，宋乾德五年（967）立。碑呈长方形，通高2.02米，宽0.8米。梦英书丹。此碑书南朝宋僧人惠休五言古诗一首，连款共180字，每五字为一体，每体各以隶书记其名并缘起。十八体分别为古文、大篆、籀文、回弯篆、柳叶篆、垂元篆、雕虫篆、小篆、填篆、飞白书、芝英篆、剪刀篆、韭叶篆、龙爪篆、蝌蚪篆、璎珞篆、悬针篆、垂露篆。梦英，宋僧，衡州（今湖南衡阳）人，《宋诗纪事》有载。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北宋咸平二年（999）立。碑螭首龟趺，碑文内容包括额题、碑题、偏旁字源目录、释字、梦英自序、郭忠恕答书及銜名。其中额题9字，3行，行3字，篆书；碑题1行，隶书；偏旁字源目录17行，行33字，篆书；释字、自序、答书及銜名11行，行字不



13-9 宋 《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局部）

等，均为楷书。安文粲刻字，元守全等立石。碑阴附刻北宋至和元年（1054）《京兆府小学规》，青石质地，通体完好，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梦英者，北宋初年以篆书名世，号称南岳宣义大师，时称梦英大士。其尝自诩其书法曰：“阳冰之后，篆书之法，世绝人工，惟汾阳郭忠恕共余继李监之美，于夏之日，冬之夜，未尝不挥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无下笔之所，方可舍诸，乃手肘胼胝，了无倦色，考三代之文，穷六书之法，俱落笔无滞，纵横得宜”，自视甚高然后世之家颇不以为然，明赵崡《石墨镌华》曰：“自负篆书，故作偏旁字源，与李斯诸人皆加贬驳，独推重李阳冰，而不免为后世吾子行所讥，至谓无所师承”；清代毕沅则直讥其“不识字”。该碑虽遭后人非议，然积极影响尚存，非一无是处之碑也。而郭忠恕其人篆法堪称唐李阳冰之后精绝，楷法亦有精到之处。

除《京兆府学新移石经记》所述碑林最早之藏石外，当时确已入藏以及可能入藏碑林的其他碑刻还有：《峄山刻石》：淳化四年（993）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依据南唐徐铉摹本重刻本。《孔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文并书，原碑刻于唐代贞观之初，不久即佚。宋初建隆二年至乾德二年（961—964）由永兴军节度、京兆尹王彦超重摩。《大智禅师碑》：严挺之撰、史维则隶



13-10 宋 郭忠恕《三体阴符经》（局部）